

## 小川尚義漢語方言地理意識： 《韻鏡》與閩南話語音對應模式

東京大學中文科外國人研究員，廈門大學中文系教授

李無未

**【內容提要】**小川尚義《日臺大辭典緒言》(1907)呈現了明確的漢語方言分區理論及其地理分佈意識。值得注意的是，他以廈門話為突破口進而建立研究閩南話語音特徵方式；提出閩南話讀書音對應《韻鏡》音的“理想”模式。其《韻鏡》音理論“原型”來源於日本學術傳統，並不是他的獨創。小川尚義“構擬”存在著明顯的不足，與高本漢中古音“構擬”的相比，性質也是不同的。小川尚義的研究留下了一些需要進一步挖掘的深層次問題，比如其貫徹方言地理理論不徹底，進而《韻鏡》中古音“擬音”與閩南語音“層次”難以“對應”，理論解釋力不足，理論與實際相“脫節”。這些問題“背景要素”十分複雜，就是在今天學者們看來，也是一時很難認識清楚的，就需要更多的學者共同參與才能有所突破。

**【關鍵字】**小川尚義；《日臺大辭典緒言》(1907)；方言地理意識；《韻鏡》與閩南話語音對應模式

有關臺灣語言地理分佈的研究，現代學者，比如丁邦新《臺灣語言源流》(1979)、洪惟仁《臺灣方言之旅》(1992)與《臺灣語言地圖集》(2019)論述得很多，成就卓著。這裏主要談談清末時在臺灣進行語言學研究的日本學者小川尚義所著《日臺大辭典緒言》(1907)一文的貢獻與局限，當然以其漢語語言地理意識為主要切入點。

小川尚義(1869—1947)是日本明治至昭和前中期的漢語音韻學、漢語方言學和臺灣南島語言研究者、辭書編纂者。師從於具有日本“現代語言學之父”之稱的上田萬年教授，1896年從東京帝國大學文科大學博言學科畢業。同年10月，赴任臺灣總督府學務部勤務。後任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現

在臺北教育大學、臺北市立教育大學等)教授、兼任臺北高等商業學校校長。1930年任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教授。1936年退休。獲日本學士院恩賜賞。不久,回歸故鄉日本松山縣。有學者稱之為“臺灣語言學先驅”、“臺灣語言學之父”(李壬癸、洪惟仁等)。

小川尚義著作主要有:《日臺小辭典》(1897,和上田萬年共著)、《日臺大辭典》(臺灣總督府,1907)、《パイワン語集》(臺灣總督府,1930)、《アタル語集》(臺灣總督府,1931)、《臺日大辭典》(臺灣總督府,上:1931;下:1932)、《アミ語集》(臺灣總督府,1933)、《原語による臺灣高砂族傳說集》(臺北帝國大學言語學研究室,1935。和淺井惠倫共同調查)、《新訂日臺大辭典》(臺灣總督府,1938上卷刊行)(也見李壬癸《臺灣語言學先驅—小川尚義教授》一文,2007)等。這當中,《日臺大辭典》為後世學者所推崇,而且也是探討小川尚義漢語音韻學與漢語方言學思想的最為重要的理論依據之一,許多學者已經為此書研究付出了不少心血。

## 一、小川尚義漢語方言分區理論及其地理分佈意識

第一、小川尚義之前以及同時代日本學者漢語方言分區理論。第一個應該提到的是日本學者金井保三(1871-1917)。金井保三曾寫過《關於〈中原音韻〉》(《東洋學報》第3號,1913),是近現代東亞學者中第一篇全面系統研究《中原音韻》的論文(李無未《日本漢語音韻學史》,2011)。

金井保三發表過一本書,頁數不多,名字叫《支那語》(1901)。《支那語》全書30頁。本書以“總說”為主要內容。分為:第一,學習中國語的必要性;第二,研究中國語方法;第三,官話;第四,中國語;第五,學習官話的心得。

金井保三對漢語官話性質的認識是明確的。金井保三認為,宋末元初,漢語由北方之強脅迫遷至南方,與南方方言發生關係,漢語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進而形成了今天的通用官話。其中,濁音清化、入聲消失、平分陰陽,都是中國漢語語言發生了革命性變化的標誌。經過明朝,以至於到了現今清朝,領土之大,前古無比。漢語內部愈益走向分化,方言隔閡十分嚴重,由此,亟需一個大家認可的共同方言。中央政權所在地之漢語方言,影響力日漸擴大,遂成為清國國家的通用語。目前我們所說的漢語官話,就是能夠在

中國上中流社會交際使用的，並且是占五分之四之多的中國國民都可以理解的漢語方言。

金井保三強調說，漢語官話又可分為西方官話、南方官話、北方官話。其中北方官話風靡全國，通用範圍很大。中國語又可以分為文話、官話、土話三類。文話通行於上流社會，而土話主要指上海話、廣東話、廈門話。官話為西方官話、南方官話、北方官話。金井保三總結了學習官話的心得，認為，就是要在以下幾方面下功夫，即：一是發音；二是尾音；三是聲調；四是死語（文言文）；五是連讀變調；六是句法；七是發音的輕重（清濁）。

《支那語》雖然只在具有“總說”性質的序論中寫下了概括性理論文字，但卻申明了當時日本學者對中國語漢語官話分區的許多見解，直接反映了當時日本中國語學界研究漢語方言分區的學術進展一些情況。

與小川尚義幾乎同時代的後藤朝太郎，在其開拓性理論著作《現代支那語學》（1908）中，對漢語方言的分區與地理分佈論述得更為詳細。在《現代支那語學》第五章，他討論漢語方言的一般性理論，比如漢語方言的發生、方言的分佈等問題。第六章，講浙江方言。比如上海方言、寧波方言、溫州方言。第七章，講福建方言。比如福州方言、廈門方言、汕頭方言。第八章，講廣東方言。比如廣州方言、客家方言。第九章，講所謂“北清中清南清方言的比較。音韻的比較、人稱代名詞的比較、基本數詞的比較”。第十章，講支那語和同族語的比較。苗語語言和支那語、安南語和支那語、西藏語和支那語等問題。無論是漢語方言還是中國境內少數民族語言，地理資訊意識十分明確，所收集的文獻資料十分豐富，是最應該重視的。很奇怪的是，後藤朝太郎並沒有按照一般學者做法把《韻鏡》納入到比較視野中來，而是以現實方言材料為基礎，論述方言分區問題。這可能是由於他研究的是“現代”這個“共時”漢語語言學所致，與建構歷時漢語語言學無關。後藤朝太郎說，自己的研究缺乏歷時漢語語言學研究成果做支撐，並且是他今後努力的方向，實際上，已經在考慮漢語歷時語言學理論體系的建構問題，這是有十分重要的前瞻意識的。

第二、小川尚義漢語方言分區與方言地理分佈理論。小川尚義漢語方言分區理論則十分明確，以中國臺灣方言地理分佈為研究目標，兼顧中國大陸的漢語方言地理及人口分佈情況探討。在《日臺大辭典緒言》（26-35頁，

1907)第一章“有關臺灣的語言”中，小川尚義認為，臺灣島內的語言，按照“通例”區分，差別很大，主要有：漳州語、泉州語、客人語（又名為廣東語）、番語四種。這當中漳州語、泉州語、客人語屬於支那語族，蕃語是南洋語，即屬於所謂アレイ・ポリネシヤ（波利尼西亞）語系。蕃語又有生蕃語、熟蕃語之別。此外，支那語、日本語在一定範圍內流行。根據他的統計，臺灣語言人群分佈為：說日語的有50000人，說漳州話的1200000人，說泉州話的1100000人，說客人語的500000人，說漢語其他方言的140000人。說蕃語的人中，說熟蕃語的10000人，說生蕃語的100000人。當時的臺灣全島人口是3000000人。

就中國語言情況來說，小川尚義認為，中國漢語方言的分類與其地理分佈，人口數量等因素也呈現了極為密切的關係，這也就成為他研究漢語方言分區理論的主要依據之一。

小川尚義說，他對中國漢語方言分類主要依據的是モヨルレンドルフ (mullendorf《中國傳教事工年報》將中國漢語方言分為四大類，1896年；《Classification Des DiaLectsChinois》，1899年，見遊汝傑，2002)的分類，但也不是完全照搬，對個別方言的名稱術語也有所修訂和補充，體現了他對漢語方言類型的基本認識。具體來看：

1. 官話。分為北部、西部、南部官話三種。有30000000人。
2. 吳語。(1)蘇州、上海話。1800000人；(2)寧波話。2500000人；(3)溫州話。1000000。
3. 閩語。(1)南部福建話（小川尚義注：廈門語族）。1000000人；(2)福州話。500000人；(3)汕頭話。500000人。
4. 粵語。(1)廣州話（小川尚義注：歐人所說廣東話）。1500000人；(2)客人語（小川尚義注：在本島稱為廣東語）。500000人。總計38400000人。

小川尚義在解釋一些術語時，對“客人語”術語及“南部福建語”方言使用的地理分佈情況進行了說明，比如：客人語。小川尚義解釋說，客人語又稱之為客話。客人語在臺灣島通行的範圍，即新竹、苗栗、臺中、阿猴等地方為最多。其分佈的地域，遠離海岸，接近中央山脈。就中國大陸來說，小川尚義稱，涉及到廣東省東部的嘉應州，經過廣州府北部到廣西省一帶。

客人語與廣州話是有差別的。但在歐洲人的論述中，常常將客人語與廣州話混淆，這種情況不可忽視。

還有南部福建話。小川尚義解釋說，按照通例，南部福建話稱之為廈門語族。廈門語族分為漳州、泉州、廈門三個類別。臺灣島南部福建話主要通行漳州、泉州話，而廈門話很少有人說。廈門語族的分佈面較窄，而泉州話在沿海區域通行；漳州話則在離岸的內陸通行。就中國大陸來說，小川尚義稱，南部福建話通行範圍涉及到：福建省南部，以廈門為中心，還有漳州、泉州、龍岩、永春，即二府二州區域。

在說明南部福建話時，小川尚義兼顧方言所在地理位置與語音特徵，他說：廈門在地理上，處於泉州和漳州之間，而它的語音特徵也是一樣，兼顧了二者的特點，所以，成為了廈門“語族”的代表（《日臺大辭典緒言》5頁）。

為了說明這個問題，他還畫了《臺灣語言分佈圖》。關於這張圖，洪惟仁《臺灣方言之旅》（1992）、項夢冰等《漢語方言地理學——入門與實踐》（2005）等學者有論述。他們對《臺灣語言分佈圖》評價甚高，認為是東亞最早的漢語方言地圖之一，是東亞漢語方言研究走向新的道路的標誌性成果之一。這個評價並不為過，這表現了小川尚義當時高超的漢語方言的調查技術手段與科學嚴謹的語言地理學研究意識，這在當時學術界是極為突出的。

中國學者有關漢語方言分類的科學論述，最為有名的是李方桂在1937年曾發表的《中國境內的語言和方言》一文，被學者們認定是中國最早研究中國境內語言和漢語方言分類的重要論文之一。後來的學者經常引用它，比如丁邦新（1982）、張琨（1992）等，主要因為他的漢語方言的分類是權威的，可信的。可以看出，李方桂把研究漢語方言分類與研究中國境內語言的語系分類緊密地結合在一起，是具有超越一般學者研究漢語方言分類的“闊大”眼光的。

梅祖麟（2010）針對李方桂《中國的語言與方言》一文中所提出的漢藏語系分為漢語、侗臺語族、苗瑤語族、藏緬語族四類觀點，去補充李方桂之前一些歐美學者比如甲柏連孜、康拉迪等對相關問題的看法，藉以表明，李方桂漢藏語系分類思想的形成，是前有所承，或“英雄所見略同”的。1874年法國學者Rosny（羅尼）指出，要作比較，必須從研究漢語古音開始，而同時，英國學者Edkins（艾約瑟）也發表了漢語古音研究論文。1881年

德國學者甲柏連孜出版了《漢文經緯》一書。康拉迪（1896）引證了甲柏連孜觀點，說明甲柏連孜早期漢藏語研究是最為突出的學術貢獻，梅祖麟的補充與闡發是客觀的，這在漢藏語系研究史上很有意義。

小川尚義《日臺大辭典》發表之後一年，日本學者後藤朝太郎（1881-1945）《現代支那語學》（1908）問世。《現代支那語學》也是在理論上繼承和發展甲柏連孜等歐洲學者學術思想的重要著作之一。後藤朝太郎在《自序》中聲稱，他在寫作《現代支那語學》時借鑒了 G. V. d. Gabclentz（甲柏連孜）和 K. Arendt（阿倫特），以及 T. Watters（沃特斯）、中國馬建忠等成果，這就為我們確立甲柏連孜等歐美學者與日本中國近代學者的漢語語言學密切關係找到了最為直接的證據（李無未，2017）。

後藤朝太郎有關中國境內語言的地理分佈，以及對漢語和藏語關係的看法，與甲柏連孜等歐洲學者的觀點非常接近。與小川尚義的論述，可以說是互為補充，應該被看作是當時日本學者研究中國方言最為具有代表性的觀點，應該引起我們的充分注意。

## 二、小川尚義以廈門話為突破口進而建立研究閩南話語音特徵方式

小川尚義研究臺灣閩南話，在理論意識上，具有宏觀上的戰略視野，具體來看：

第一、小川尚義研究閩南話語音最大的整體性特點是，抓住其內部的差異，尋求語音特徵加以辨析。在研究過程中，凸顯出閩南方言語音內部和外部的語音關係，由此可見，其研究思路是有明確的針對性目標的。

小川尚義說，自己的閩南話語音特徵研究，以廈門話為突破口和主攻方向，具體來看，研究方式是：一是研究廈門話特徵，就要觀察它和中國語方言的“語形”關係；二是研究廈門話和泉州話漳州話的關係，進而觀察廈門話與泉州話、漳州話“近似度”。

但小川尚義的研究也有一個基本的前提，就是，先要把廈門話語音內部“層級”與“糾葛”關係搞清楚才能認識其本質特性。小川尚義認為，廈門話語音也不是簡單明瞭的平面“共時”存在的，而是一個複雜的“歷時”與“共時”語音統一體。小川尚義說：廈門話語音分為讀書音和俗音兩種。讀書音

用於文章語體，而俗音用於俗話口語語體。儘管如此，在一般的談話中，二者混用的情況也是不少，就像日本語辭書字音和國語口語音混用一樣。此即所謂讀書音和俗音“轉訛”現象。他舉了“歌人水百東田”六個字為例。他認為，讀書音保存著“古形”，所以，就以廈門話讀書音為標準，所標記的研究對象廈門音都是讀書音。

小川尚義廈門話語音特徵研究理論基礎。我們可以看到，小川尚義廈門話語音特徵研究採用的是歐美盛行的比較語言學理論與方法。無論是小川尚義的老師上田萬年，還是上田萬年的學生後藤朝太郎，以及金澤莊三郎，都是如此，深受當時歐洲歷史比較語言學理論與方法的浸染。上田萬年曾在德國師從甲柏連孜，回國後，他極力向他的學生們推薦甲柏連孜的漢語文言語法名著《漢文經緯》（1881）與《語言學》（1891），並作為研究日語和漢語的主要參考書。後藤朝太郎《現代支那語學》、豬狩幸之助《漢文典》（1898）、廣池千九郎《漢文典》（1905）也不例外。

後藤朝太郎在發表《現代支那語學》之前，曾與金澤莊三郎合作翻譯併發表了德裔英國學者マックス・ミュラー（馬克思·穆勒，Friedrich Max Müller, 1823-1900）《語言學》一書。馬克思·穆勒闡述了語言學內涵及比較語言學基本理論，以及語言學研究歷史發展的基本脈絡。其上冊主要各章目錄為：語言學而下學的方方面面；語言發達而諸種學說之矛盾；經驗期；分類期；發現梵語；所知印度之外的梵語資料；語言系統的分類。其下冊各章主要目錄為：閃米特語族；語言分解；形態分類；烏拉爾阿爾泰語族；雜混語言；語言同一起源論；理論期。涉及到漢語的，在上冊第二章“語言發達而諸種學說之矛盾”中設置了“中國語的變化”一節（66-67頁）談“十”這個詞的的語音變化和意義的關係，認為表現了“單綴語”的特點，並結合藏語加以說明，認定漢語藏語屬同源關係，具有可比性。上冊第四章分類期設置“中國語語法”一節（144-147頁）談漢語名詞的“格”問題，同時，也涉及到漢語形容詞、副詞“格”問題。比如漢語名詞的“格”分為：主格、屬格、與格、多格、地格、作格。由此可見，後藤朝太郎《現代支那語學》學術承襲者不僅僅是甲柏連孜《漢文經緯》，很可能與馬克思·穆勒《語言學》比較語言學理論關係也十分密切。

小川尚義向上田萬年學習語言學理論，不可避免地受歐洲比較語言學的



影響，這是可以肯定的。而且，他的語言學理論基礎也是與之相關的。我們認為，小川尚義的學術源流在日本，如果不去看日本和小川尚義的學術源流關係，很顯然，對小川尚義的學術意義評價就不會到位。

第二、小川尚義廈門話語音特徵研究理論特點。小川尚義說：研究廈門話語音特徵，和中國各種方言語音比較是必要的，但這種比較的語音基礎卻是《韻鏡》。他認為，《韻鏡》表現了中國古代語音，在對廈門話語音結構分析上，尤其是類別的辨析上特別細緻，所以，得出的結論十分可靠。在比較語音研究上，視野非常廣闊，將廈門話語音與中國各種方言語音，主要是：上海、廣州話、寧波話、南京、汕頭、北京、福州、溫州、客人話，以及安南、朝鮮語音加以比較，從而看出其“差異”特點。

第三、小川尚義廈門話語音特徵研究著眼點。1. 語頭音特徵。包括唇音、舌尖音、舌尖裏音、舌面音、舌根音、喉頭音。比如論述唇音 [p]，說，它在《韻鏡》中屬於幫母。廈門話大多作 [p]，但也有少量的作 [pʰ]，送氣（7頁）。2. 語尾音的特徵。唇音 ([p][m])、舌尖音 ([t][n])、舌根音 ([k][ŋ])。3. 韻的特徵。用 106 韻之平聲 29 韻研究。4. 音調的特徵。認為廈門、漳州 7 個聲調，泉州音聲調雖然也是 7 個聲調，但在調值上有着細微的差別。

### 三、小川尚義之閩南話讀書音對應《韻鏡》音“理想”模式

這裏有一個問題，即小川尚義（1907）研究閩南話語音特徵，為何一定要牽扯上《韻鏡》？閩南話語音特徵與《韻鏡》到底有何關係？前面已經提到過，小川尚義說，《韻鏡》表現了中國古老的語音。《韻鏡》對漢語語音內在結構分析，尤其是音值的辨析上十分精密。但我們進一步要問：《韻鏡》表現了中國古老的語音，這個古老體現的具體時間範疇如何？是漢語中古音，還是漢語近代音？亦或是上古音？就一般學者的認識，比如洪惟仁教授等來看，小川尚義這裏指的是《韻鏡》漢語中古音。但这就又有一個問題出現了，即，小川尚義研究的閩南話讀書音語音特徵一定等同於《韻鏡》漢語中古音嗎？

小川尚義（1907）以《韻鏡》中古三十六字母為研究基礎，在確定《韻鏡》中古音聲母系統上是有獨到見解的，這一點我們曾經論述過（李無未《臺灣漢語音韻學史》，2017）。即，小川尚義將三十六字母中的“照組”一分為二，



即所謂“照二組”、“照三組”(小川尚義《日臺大辭典》26-35頁, 1907), 這確是他研究《韻鏡》漢語中古音的一個亮點。清人陳澧《切韻考》系聯《廣韻》反切上字, 分為“莊初崇生”與“章昌船書禪”兩組, 表明, 他們的音類是有對立的, 所以, 是兩套聲母。小川尚義是否看過陳澧《切韻考》不得而知, 但“英雄所見略同”確是事實。這是與許多日本學者研究《韻鏡》漢語中古音不同的地方。就是《韻鏡》漢語韻母系統的特徵。用“平水韻”的106韻中平聲29韻研究, 確定了《韻鏡》中古音性質是沒有問題的。但問題的關鍵是, 閩南話讀書音語音特徵一定和這個《韻鏡》漢語中古音特徵相吻合嗎?

閩方言特色鮮明, 具有其他方言所不可替代的漢語語音史價值, 這是毫無疑問的, 許多學者進行了有益的探索。

張光宇《羅傑瑞教授與漢語史研究》(2014)總結美國學者羅傑瑞的學術貢獻時說, 羅傑瑞教授在漢語史上的主要貢獻可分兩方面來看: 其一是提出建議, 重新檢視高本漢的基本假設, 例如, 韻圖不是透視《切韻》的唯一憑藉。其二是嘗試重建古閩語, 把高本漢所說的閩語例外揭示出來。羅傑瑞宣稱: 《切韻》的重建形式不足以解釋閩語聲調的發展。這在漢語音韻學界引起了不小的轟動。對聲母系統的重建。羅傑瑞認為, 在古音條件相同的情況下, 為何古全濁聲母清化後有的送氣有的不送氣? 他注意到, 建陽和邵武等方言, 部分字的聲母讀法有異而聲調亦複不同。根據比較法的不同, 有三組對應關係就應該建立三個原始音位, 這是執行時的嚴格要求。羅傑瑞建立了48個原始音位, 還原早期狀態, 使得很多語音現象得到較為滿意的解釋。至於漢語方言層次問題, 成系統的特殊音讀(而非零散例外), 有時候保留的是早期的痕跡, 反而能成為重建語言歷史的關鍵。但前提是, 必須事先排除借詞和類推等其他外部因素。完全排除之後, 比較法也才能堅持有幾組對應關係就建立幾個原始音位的原則。如此, 引進層次觀念顯得尤為必要。張光宇認為, 這也是羅傑瑞對漢語音韻學研究理論的最為重要的貢獻。

還有一些學者研究閩方言後, 認為, 漢語閩方言讀書音語音特徵也是十分複雜的, 與白讀糾葛在一起, 既不規則, 也存在著“例外”語音現象, 張琨《論比較閩方言》(1984)、《再論比較閩方言》(1989)的研究就突出了漢語閩方言語音的複雜性特徵。

張琨說, 閩方言最大的特色是文白異讀的紛歧現象, 尤其是閩南方言最

為顯著，這是研究閩方言特徵時最大的困難。張琨在這裏只討論廈門、潮陽、福州三個方言。廈門音根據羅常培《廈門音系》（1930），間或參考周長楫（1983）；其次，參考張盛裕，以及蘭雅秀和王天昌福州方音論文。張琨主要探討了以下問題：

第一、關於閩方言文白異讀。由於歷史上的原因，由秦漢經過隋唐到現在，從不同的地域利用不同的途徑不斷輸入閩方言而形成文白異讀現象。高本漢給《切韻》語音構擬時就感到閩方言材料難以應用。文讀勉強理出一個系統，白讀支離破碎，系統性很差。

第二、閩方言文白異讀聲韻調。一是聲調。閩方言聲調有三套：一套代表北方方言，平聲分陰陽，上聲分陰陽，陽上變去，去聲不分陰陽。鼻音邊音及《切韻》喻母上聲字仍讀上聲，不跟隨濁塞音濁擦音讀如去聲。所以，廈門、潮陽、福州話中都有鼻音邊音喻母上聲字有兩讀，文讀陰上，白讀陽上，或讀陽去。另兩套聲調代表南方方言，平上去入都分陰陽，有兩種變體：一種是有陰平陽平陰上陽上陰去陽去陰入陽入，另外一種就是陽上用陽去合流。潮陽方言有很多《切韻》濁聲母的去聲字，文讀陽上，白讀陽去。文讀陽上是一種方言，這種方言七個聲調，大多數閩方言都屬於這種聲調系統。白讀陽去屬於另一種方言，其中陽上陽去有別。廣東東北角的閩方言屬於這種聲調系統，有八個聲調。

第三、聲母。閩方言有文白異讀的差別。《切韻》輕唇音聲母字在閩方言中文讀讀[h(u)]，白讀讀[p(u)]。《切韻》知徹澄聲母字許多在閩方言中仍然讀舌頭塞音聲母，與端透定相似。廈門、潮陽方言許多字讀塞擦音聲母，福州方言卻很少。潮陽方言白讀舌頭塞音，文讀塞擦音。《切韻》擦音聲母心、邪、書、生在閩方言中文讀讀擦音，白讀讀塞擦音。《切韻》匣母字在閩方言中舌根塞音聲母。匣母字還有兩種讀法：一種是讀清喉擦音聲母，陽調。另一種是讀零聲母陽調。《切韻》雲（喻三）在閩方言中文讀讀零聲母陽調，白讀讀清喉擦音聲母，陽調。《切韻》以（喻四）在閩方言中文讀讀零聲母陽調，白讀讀舌頭塞擦音或擦音聲母。三是韻母。所構擬文讀韻母系統有很多地方和《切韻》相似，比如欣文與真諄、元韻與魂痕相近，東三鍾韻在舌根音喉音聲母後邊保存著三等介音，以及廈門等方言中的魚虞有別等。止攝唇音聲母字三地文讀讀開口，白讀讀合口。蟹攝三四等字，廈門、

福州，都有文白兩讀，其中《切韻》二等四等字合流是閩方言白讀中的特色。《切韻》喉韻字白讀三個方言都讀 [au]，而文讀，廈門 [ɔ]、潮陽 [ou]，福州 [eu]/[ɛu]。假攝二等和三等，文讀主要母音 [a]，而白讀主要母音 [e]。三地白讀一等韻哈灰韻和泰韻有分別。果攝字有兩種白讀，一種是廈門 [ua]，潮陽 [ua]，福州 [uai]；另一種是廈門 [e]，潮陽 [ue]，福州 [ui]。其他，如遇攝一等、三等；虞韻；曾攝三等和梗攝三四等；臻攝、深攝、江攝、山攝、鹹攝、宕攝、通攝文白異讀也很複雜，差別不小。但張琨羅列差別現象比較多，最後卻沒有進行總體性的歸納，更很少對其來源做解釋。

張琨主要從聲母、韻母、聲調三個方面比較《戚林八音》（閩東）、《建州八音》（閩北）、廈門（閩南）、潮陽（閩南）等四種閩方言的異同，力圖建立閩方言不同的音韻層次，來作為進一步開展閩方言比較研究的基礎。張琨說明，閩方言保存著一些《切韻》的音韻特徵，比如三四等合流，證明韻圖四等分立是有道理的，也很有必要。真實殷訖有別，仙薛元月不同，也可以證明《切韻》的分韻依據。他認為，利用《切韻》音韻類別作為研究的“間架”來掌握閩方言的音韻歷史，儘管免不了有些例外現象難以解釋，但大體還是有規律可循。完全放棄《切韻》這個語音理論體系，則根本無法駕馭這些方言材料了。與《論比較閩方言》相比，張琨更為重視閩方言文獻的歷史比較作用，同時，通過比較閩方言內部“文白異讀”的差別，就更加突出了《切韻》音系在研究閩方言複雜語音系統上所具有的無可替代的理論“框架”價值。

楊秀芳《閩南語文白系統的研究》（1982）抓住閩南語文白系統的特徵，並闡明影響其存在的各種音韻條件，對文白混雜種種所產生的問題進行合理的解釋。基本觀點是：一是，文讀系統是一個移借的系統，與它相對的白話系統則為原來的本地系統。二者雖有親屬關係，卻不具有親子相承的直接關聯。二是，文讀系統的造成，是由於文化上優勢語言向外傳播的結果。不同的時代，不同的地域，有不同的文化上的優勢語言。同一優勢語言，因本身的演變也有早晚之不同，因此，不能假定所有閩南各方言的文讀音只有一個來源，只借入一種文讀音。三是，文白的辨認雖由白話用的場合開始，但語言應用上的“文讀音、白話音”不就等於“文讀層、白讀層”。文白的系統研究，必須著眼於相當完整的層次。四是，有文白異讀的辭彙，固然可以看出兩種不同的形式，但對許多一讀字的觀察，亦頗重要。因為，一讀字可能

代表文白形式相同，但也可能暗示不同的異讀因失落其中一種讀法而成為一讀字。

楊秀芳廓清閩南語文白系統事實，為漢語音韻史研究、漢語方言學理論的構建上做出了突出的成績。比如閩南語文白系統的厘清為漢語音韻史研究，不僅僅是如董同龢（1960）所說的超越《切韻》系統的地方很多，而且，還佐證了漢語音韻史演變的許多問題。閩南各方言的文讀音移借多層次，說明文讀音來源的多向性，和漢語音韻史的時間層次相關，恰好和中古音演變的次序相疊加。

當代一些年輕學者的研究也值得注意，比如杜佳倫《閩語歷史層次分析與相關音變探討》（2010）談閩語的地理分佈，以及主要次方言閩南、閩東、閩北等區的音韻特點，並且強調閩語多重來源的實際形成歷史。她在進行閩語韻讀的歷史層次分析時，依據音讀特點與音韻關係截然有別的分層表現，認為閩語的韻讀系統在歷史分層上至少需要分為四項層次：唐宋文讀層、南朝江東層、晉代北方層以及上古層，其中南朝江東層與晉代北方層的地域差異性多過於時代變異性。依據古全濁聲類的音讀表現，閩語的聲母系統在歷史分層上至少也需要分為四項層次：唐宋文讀層、江東層、北方層以及非漢語干擾層，其中北方層有部分古聲類帶有明顯的上古特色，其歷史時間可以上推至西晉以前，不完全等同於韻讀系統的晉代北方層；此外，古閩越語的母語使用者在學習古漢語時，依其音韻習性進行一系列的音韻調整改讀，遂形成具有系統特色的非漢語干擾層；由於閩北的古濁聲類保有複雜的多重層次異讀，與聲母音讀密切相關的聲調層次也就非常豐富，大致也能分為四項相應的聲調層次，然而相對於此，閩南、閩東由於古濁聲類沒有複雜的音讀差異，也就沒有豐富的層次差異，唯在濁母上聲與去聲部分有重要的層次表現。她討論了語言接觸、層次疊置、語音變化與變異的交互作用，除了各類音變導致層次音讀的變動，更從不一樣的角度切入探究層次競爭所引發的音讀變化與結構重整。

由此，我們認為，小川尚義（1907）用《韻鏡》中古音對應閩南話讀書音語音特徵煞費苦心，但因為閩南話讀書音語音歷史層次的複雜性，很難整齊劃一，去完全對應《韻鏡》中古語音特徵，這就會帶來了“對應”過程中“異質”要素“當道”，而存在難以嚴格厘清對象關係的突出問題，並沒有達到

實際應用的良好效果，因此，小川尚義用《韻鏡》音對應閩南話讀書音語音特徵做法，還只是一個理想化的模式而已。一些學者強調小川尚義《韻鏡》中古音與閩南話讀書音對應研究已經取得公認成果（洪惟仁 1994）。但按照張琨等學者的研究結果，恰恰不是這樣，由此，洪惟仁等學者的結論是不是該重新考慮了？

#### 四、小川尚義《韻鏡》音理論“原型”及與高本漢的理論模式差異

必須指出的是，小川尚義（1907）為了說明《韻鏡》中古音與閩南話讀書音的對應性，還引用了諸如上海、南京、汕頭、北京、福州、溫州、客人話、廣州話、寧波話，以及安南、朝鮮語音，這些語音的引用，出於比較的目的“擬音”自不待言，但和《韻鏡》中古音與閩南話讀書音對應“擬音”有何關係呢？

從語音時代特徵上講，這些語音的歷史層次不同，甚或單一、甚或疊加，如果是以中古音研究視野看待，是不是過於冗餘？小川尚義在具體的論述中，並沒有嚴格的“格裏姆式”語音對應意識，只是解釋其中的語音差異所造成的結果成因，進行其比較的意義也就僅此而已。這和高本漢嚴格的歷史比較語言學的理論與方法是不同的。高本漢《中國音韻學研究》列舉了 33 種方言，目的是為構擬漢語中古音服務的，因此，每一個方言語音材料都派上了用場，並且一對一的講其語音對應關係，和漢語語音史“譜系樹”理論建設直接掛鉤，構建漢語中古音“共同語”目的是十分明確的，由此看來，小川尚義還缺乏整體性規劃，歷史語言學理論意識與原則貫徹得並不徹底，這也是其研究的致命缺憾之一，當然也是他與高本漢研究模式本質區別點之一。

第一、小川尚義《韻鏡》中古音與閩南話讀書音對應“擬音”模式。洪惟仁教授用來和高本漢漢語中古音構擬比較，肯定了小川尚義《韻鏡》中古音與閩南話讀書音對應“擬音”模式。小川尚義漢語中古音構擬，具體記錄在《日臺大辭典》(1907)“緒言”第三章第二項第一款《南部福建語ノ特徵》中。洪惟仁教授解釋說，小川尚義，是“為呈顯閩南語在漢語方言中的特徵而作現代漢語方言及域外漢字音的比較，為了理解今音的分歧，作了中古音擬測。”“對小川尚義來說，漢語方言或域外漢字音研究或中古音擬測，不過是閩南語研究的基礎，閩南語研究才是他的目的，閩南語以外的漢字音比

較是閩南語研究的手段。小川尚義並未解釋為什麼要作中古擬測，但從全文看來，顯然目的只是讓讀者瞭解現代漢字音的分歧原委而已，擬音不是小川文的目的。”（洪惟仁 1994：10 頁）

關於研究方法，洪惟仁教授解釋說，小川尚義“以中古音類為綱，舉例羅列閩南語以下各種漢語方言、域外漢字音，製成漢字方音對照表與古今音對應表，為便於理解現代音之的分歧，做了中古音聲母、韻尾等輔音部分的擬測。”“擬測”既然成為了小川尚義漢語中古音研究方法。那麼這個“擬測”的具體文獻所指是什麼呢？洪惟仁教授引用了小川尚義在《緒言》中說的一段話，即：“研究南部福建語在音韻上的特徵，勢須比較中國各種語音，今此等比較之基礎，以《韻鏡》為主……。”（《日臺大辭典》6 頁），由此，洪惟仁教授解釋說，“也就是採用《韻鏡》的音韻系統為綱，然後‘聲母’、‘韻尾’、‘韻母’、‘聲調’四部分，依《韻鏡》之音類，舉例羅列閩南語以下各種漢語方言、域外漢字音，製成漢字音對照表，最後總結製成古今音對應表。為呈顯現代音之特徵，於中古聲母、韻尾等輔音部分做了擬測。”（洪惟仁 11 頁）小川尚義“擬測”以《韻鏡》為主是可以肯定的，但為何小川尚義“擬測”以《韻鏡》為主？洪惟仁教授引用了小川尚義的原話加以說明：“……今此等比較之基礎，以《韻鏡》為主，蓋《韻鏡》之音雖未必表示中國語之最古音，但其音韻之種別頗為精密，在比較上最為方便……。”（《日臺大辭典》6 頁）

小川尚義的“擬音”以《韻鏡》為主，但也存在著一些缺憾，洪惟仁教授也有所總結，比如：“不過就研究方法的嚴謹性而言，小川尚義顯然不及高本漢，小川沒有一套精密的標音符號系統，也沒有親自做過廣泛的漢語方言調查，小川用的是精密性不夠的羅馬字。他的方言資料除了閩南語之外全部採用他人的資料。”“擬音說明非常簡單。”（12 頁）進行方言比較的材料，“除閩南語外主要採用別人的資料”。具體的，小川尚義在《緒論》中說是：“中國各種語言之中，上海、南京、汕頭之音取之於 Williams（衛三畏、廉士甫）氏辭書（《漢英韻府》，1874），福州、客人、廣州、溫州、寧波、朝鮮、安南諸音取之於 Giles 氏辭書（《華英大辭典》，1892），但廈門音依編者之綴字法。”（9 頁）。

洪惟仁教授認為，小川尚義採用《韻鏡》作為中古音基礎，比高本漢高



明（洪惟仁 1994：14 頁），由此展開了小川尚義與高本漢中古音構擬的“比較”，認定小川尚義的“擬音”與高本漢類似，有“超過”高本漢的地方（洪惟仁 1994：1 頁），

但小川尚義《韻鏡》中古音與閩南話讀書音對應“擬音”模式理論依據為何洪惟仁卻沒有說明，這就讓人產生了疑問，即小川尚義《韻鏡》中古音與閩南話讀書音對應“擬音”模式按照什麼樣的方法進行的？是他自己的獨立發明呢，還是與別人有關係，另有來源呢？如果是他自己的獨立發明，得出他有比高本漢“高明”地方的結論似乎就能夠成立，但如果不是，是不是這個成績應該既歸屬於別人而又包括小川尚義呢？我們認為，這是評估小川尚義《韻鏡》中古音與閩南話讀書音對應“構擬”成果的關鍵，如果不把這個問題搞清楚，對小川尚義《韻鏡》中古音與閩南話讀書音對應“擬音”研究成果的評價就是沒有根基的，而且，還會導致“移花接木”現象的發生，就存在著過分抬高了小川尚義的地位，卻遮蔽了其他學者的成績，比如遮蔽有可能是比小川尚義更為早，也取得了不凡成績學者大島正健、豬狩幸之助“光輝”的嫌疑。這樣做的結果就會是，對這些取得了不凡成績學者來說肯定就是不公平的做法，如此去談小川尚義與高本漢中古音成果的比較，就是個“虛幻”而不必要的命題。因此，澄清小川尚義《韻鏡》中古音與閩南話讀書音對應“擬音”模式的“繼承”或“發展”的“因果關係”顯得尤為必要，也是深入研究小川尚義《韻鏡》中古音與閩南話讀書音對應“擬音”模式的緊迫任務。

第二、小川尚義之前學者對《韻鏡》中古音的“構擬”理論與方法。我們認為，小川尚義《韻鏡》中古音與閩南話讀書音對應“擬音”模式與日本漢語音韻學界《韻鏡》中古音擬音傳統相關，並不是他的獨創，而是他繼承和發展許多學者研究的結果。

我們在《日本漢語音韻學史》(2011)中提到了大島正健在 1898 年（比小川尚義早 9 年）對《韻鏡》音的擬音情況。就當時來說，大島正健研究《韻鏡》，在理論與方法上獨樹一幟。比如他在《漢音、吳音和中國音的比較》一文中就宣稱，以舊說為根基，面向新境界，進行新考證。他提出不同於以往的觀點，比如，日語吳音也有新舊之分，漢音也有隋唐音與其他時段語音之分。要深入研究漢音、吳音與中國語音的關係，必須擴大視野，於是把《韻



鏡》音、梵漢對音、“現實”的官話、江南音、福州音、廈門音、廣東音進行對比。他解釋說，官話不取北京官話，而取南京官話。江南音以蘇州音為代表，包括上海、杭州、寧波等，但大同小異。具體的描寫，用羅馬字母標音。過去用羅馬字母標音取其近似，現在力求精確。諸家記法不同，選擇最恰當的使用方式。按照這個原則，比如 baorudaogien 的《福州方言集》，開始記 p、t、k，後來記 b、d、g。macikugalien 的《廈門方言集》也屢見改變。《韻鏡》音，用 ayiteru。《梵漢對譯》的同時，也參照和漢對音，以經過審訂而可靠的《古事記》、《日本記》、《萬葉集》音為依據，當時主要的可引用的成果是楫取魚彥《古言梯》、石塚龍磨《古言清濁考》、春登上人《萬葉用字格》。而不是太田全齋《漢吳音圖》（1815）等“虛擬語音”資料。比如“音之部”，對涉及到的《韻鏡》聲母進行了擬音。幫滂並明分別是 p、p'、b、m。其中次清擬作送氣音。在“韻之部”，對涉及到的《韻鏡》韻母進行了構擬，並考慮到了開合口、內外轉，以及等位因素，貫穿了一定的歷史比較的理論意識。如此對《韻鏡》音所作的比較研究，在《韻鏡》音 19 世紀研究史上還是不多見的，具有重要的理論方法意義。

此外，在 19 世紀末，還有一些學者對《韻鏡》中古音用羅馬字及日本假名進行“擬音”，貫穿著比較成型的“擬音”理論與方法。比如日本學者豬狩幸之助《漢文典》（1898）所附《〈韻鏡〉解釋》中古音擬音。

豬狩幸之助《漢文典》附錄《〈韻鏡〉解釋》“三十六字母條”（第 102-104 頁），在解釋“三十六字母來源”時，用了《音韻日月燈》的說法，即李唐之際舍利創立悉曇字母，後來，守溫和尚增加了“娘床幫滂微奉”六母。在列了“悉曇體文以及遍口表”之後，對三十六字母用羅馬字進行了“擬音”（[] 號中是豬狩幸之助擬音，（）號中是小川尚義擬音），即：見 [k](k)、溪 [k'](k')、群 [g](g)、疑 [ng](ng)、端 [t](t)、透 [t'](t')、定 [d](d)、泥 [n](n)、知 [ch](t)、徹 [ch'](t')、澄 [dj](d)、娘 [ñ](n)、幫 [p](p)、滂 [p'](p')、並 [b](b)、明 [m](m)、非 [f](f)、敷 [f'](f)、奉 [v](v)、微 [m](v)、精 [ts](ts)、清 [ts'](ts')、從 [dz](dz)、心 [s](s)、邪 [z](z)、照 [ch](ts(照二)ch(照三))、穿 [ch'](ts'(穿二)ch'(穿三))、床 [dj](dz(床二))(床三))、審 [sh](s(審二)sh(審三))、禪 [zh](zh)、影 [yy](())、匣 [h](h)、喻 [y](y)、曉 [hh](h)、來 [l](l)、日 [j](zh)。豬狩幸之助還解釋說，唇音第三等，舌齒兩音第三、第四等稱之為“輕母”，其餘稱之為“重母”，

考慮了三等韻擬音的特殊性。

在“二百六韻”條，豬狩幸之助涉及到“內外轉”、“開合口”、“四等”、“三內”、“四聲”等問題。具體擬音，比如入聲字用 p、t、k 字母表示，閉口韻尾，用 m 表示。對四十三轉用羅馬字進行了擬音，ng、n、m 鼻音韻尾分明。在“本朝（即日本）音韻學史”一節中，以 1265 年唐本《韻鏡》傳入南都轉經院庫中為研究起始時間，中經文雄《磨光韻鏡》、太田全齋《漢吳音圖》，到岡本保孝《韻鏡考》得以完成《韻鏡》基本研究體系建構。這個回溯，實際上是論述了《韻鏡》音構擬的歷史，也表明，豬狩幸之助《韻鏡》音構擬，是繼承前人幾百年的研究成果，不是空穴來風。

稍後於小川尚義的日本學者，比如對《韻鏡》中古音“擬音”，最為突出的是佐藤仁之助《速成應用漢學捷徑》（1910）和大島正健《韻鏡音韻考》（1912），他們與大島正健、豬狩幸之助《韻鏡》中古音構擬理論與方法基本相同，只不過在語音對應關係的說明上更為成熟而已。

## 六、餘論

小川尚義《韻鏡》中古音與閩南話讀書音對應“擬音”模式與大島正健、豬狩幸之助、佐藤仁之助《韻鏡》中古音構擬理論與方法如出一轍，只不過研究的語音對象發生了一些變化，由日本漢音、吳音或者《韻鏡》中古音變成了閩南話讀書音。另外，在考察視野上，更加注重方言地理的“共時”差異因素，而不是歷時發展變化因素，這就使得他的研究語言地理類型意識更加濃郁，這是應該肯定的。

小川尚義方言地理意識來源如何？我們認為，這和德國學者パウル（paul）《言語史原理》（1880/1965）理論傳入日本有關。日本的方言地理學是日本語言地理學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語言地理學是 19 世紀末從歐洲輸入來的。東條操《方言研究小史》（1962）說，新村出是上田萬年的弟子，寫過一篇文章，叫《上田先生與方言調查》。在這篇文章中，新村出回憶在東京大學聽上田萬年學術講演，及上田萬年上講方言課時，用很長時間介紹德國學者パウル（paul 保羅）《言語史原理》（1880）方言分化論情況，涉及到了語言地理學的內容。後來新村出、保科孝一等調查方言、認識方言，自

覺不自覺地實踐パウル（paul）的理論（7-8 頁）。パウル（paul 保羅）《言語史原理》成為語言地理學理論進入日本的起始。

《言語史原理》（1880/1965）第二章，語言的分裂。談到由有機的自然類推，應該把握需要解決的問題，遷論及語言變化與分化、未能成為相互從屬關係之個體分化，沒有適當的系圖可以比喻，以及“方言之差異，所能看到達到漸次階段——突出本來特質狀態——語言的分離——人工語與文學語：無限增大方言差異”問題。這當中，“鄰接地域之交通和相互影響，產生差異，以及後發生變化”之論述（36-40 頁），是典型的語言地理學內容，突出了地理要素對促使方言分裂所發揮的極大作用。此書對上田萬年及其弟子的方言地理學意識觀念的影響，並不亞於甲柏連孜的《語言學》（1891）與《漢文經緯》（1881）。難怪東條操談日本的方言學起始，要從パウル（paul）《言語史原理》對上田萬年及其弟子影響談起。

石黑魯平《國語教育の基礎としての言語學》（1929）談“語言研究史”，專門列“パウル（paul）以後至現代”一節（47 頁）稱讚他體現了新的語言學革命精神。又說到，上田萬年教授通過精讀此書，傳播其學術思想意識，使日本語言學界理論意識學術水準大為提升，進入到了一個新的境界，語言學理論意識大潮為之大變。說明此書，對日本主流語言學界影響至大。

語言地理學的興起是與人們認識到比較語言學理論的解釋能力有限開始的。小林好日《東北方言の言語地理學的解釋》（1941）說：西洋語言研究法在十九世紀取得驚人的進步是不爭的事實，但比較語言學所用採用的研究法，既有長處也有短處。採用這個方法以德意志國家最為顯赫，從梵語研究到印度的波尼尼語法，受其刺激，融入自然科學精神，細緻分析語言形態，論述其構成。力求文獻資料充足，通過比較事實，尋求對應關係，但也是免不了資料不夠齊全的問題。各個時間段資料是否豐富參差不齊，缺欠明顯。研究結果，太抽象，無限複雜的語言事實，無法論證，只能用理論去比附。而新興的語言地理學者，在實實在在的人類生活中捕捉到特別直觀的語言，隨機應變，以柔性的方法，使比較語言學煥發了新的生機。語言地理學把詞語從一個個地點中捉到，在自然環境中研究起源。詞語有了自己的地理條件，而明確了這個條件，就弄明白了它的歷史。解釋詞語空間分佈，又取決於詞語生死時代，再構擬其形成。其意義在於，語言地理學就像語言地質學一樣，

成為了語言層位學（462-464 頁）。

柴田武《方言論》（1988）對比較語言學與語言地理學的區別有所論述：言語地理學，有的又稱之為“地理語言學”。語言地理學是 19 世紀歐洲一批學者從批判比較語言學理論發展而來的。比較語言學是依據過去到現在諸語言之比較，揭示其近親緣關係的“系譜”之學，是語言史研究的一種方法。目的是找到諸語言之間嚴格的音韻對應關係（音韻法則），當然“不許有例外”。基於此，推定分裂之語言本來的祖語狀態。因此，蘊含著語言是一個“自然有機體”的思想。而語言地理學與之相反，其音韻法則，語言變體，即語言整體應該發生變化，這才應該是有規則的。由其投影可見，地理分佈並非是同一模樣的。德意志的 Wenker, G 是一個信奉音韻法則的學者，他通過製作德意志語言地理圖發現，各區域方言音韻分佈模樣，都是相異的（67-68 頁）。

很自然，歐洲語言地理學對日本語言學研究意識的影響很大。應用於方言學研究，形成了多個學術流派，其中最具影響力的是著名的方言地理學理論流派。

小川尚義運用方言地理學理論卓有成效，在漢語方言分區理論及其地理類型意識的貢獻是有目共睹的，尤其是閩南話語音內部區別性特徵及其地理分佈的研究思路，具有明顯的前瞻性的，就是在今天看來，也是充滿著一定的科學理論意識的，必須加以充分肯定。

雖然如此，小川尚義的研究卻也留下了一些需要進一步挖掘的深層次理論性問題。比如其貫徹確方言地理理論不徹底，進而《韻鏡》中古音“擬音”與閩南語音“層次”難以“對應”，解釋力不足等理論與實際“脫節”問題。這些問題十分複雜，就是在今天學者們看來，也是一時很難解決的，就需要更多的學者共同參與才能有所突破。

參考文獻：

1. 金井保三（1871-1917）述《支那語》，東京：哲學館漢學專修科漢學講義，1901 年。
2. 後藤朝太郎《現代支那語學》，東京：博文館，1908 年，後被列為帝國百科全書之中。
3. 小川尚義《日臺大辭典緒言》，《日臺大辭典》1-212 頁，臺北：臺灣總督府，

- 1907年。
4. 甲柏連孜 (Georg von Gabelentz) 著, 姚小平譯《漢文經緯》(Chinesische Grammatik) (萊比錫: 魏格爾出版社, 1881), 北京: 外語教學與出版社, 2015年。
  5. マックス・ミュラー (馬克思·穆勒, Friedrich Max Müller) 《語言學》, 1874年出版。金澤莊三郎、後藤朝太郎譯文分上、下冊。東京: 博文館, 1907年, 列入帝國百科全書, 第157、158編。
  6. 張琨《論比較閩方言》, 臺北: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55本第3分卷415-458頁, 1984年。
  7. 張琨《再論比較閩方言》, 臺北: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60本第4分卷829-875頁, 1989年。
  8. 張琨《論漢語方言的分類》, 《中國境內語言暨語言學》1《漢語方言》1—22頁, 臺北: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1992年5月。
  9. 杜佳倫《閩語歷史層次分析與相關音變探討》, 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 楊秀芳指導, 2010年。
  10. 洪惟仁《臺灣方言之旅》, 臺北: 前衛出版社, 1992年; 《臺灣語言地圖集》, 臺北: 前衛出版社, 2019年。
  11. 洪惟仁教授《小川尚義與高本漢漢語語音研究的比較——兼論小川尚義在漢語研究史上應有的地位》, 臺北: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臺灣史研究》1.2:26-84頁, 1994年。
  12. 李壬癸《臺灣語言學先驅——小川尚義教授》, 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臺灣語言學一百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 臺北: 2007年9月8日。
  13. 大島正健《漢音、吳音和中國音的比較》, 東京: 《國學院雜誌》第24卷第7號, 1898年。
  14. 李無未《小川尚義與高本漢漢語音韻研究重要史實辨正——向洪惟仁教授請益一》, 《聲韻論叢》第20輯, 臺北: 學生書局, 2017年10月。
  15. 李無未《小川尚義中古音“擬音”及與高本漢比較“非對稱性”問題——向洪惟仁教授請益二》, 《聲韻論叢》第20輯, 臺北: 學生書局, 2017年10月。
  16. 李無未《日本漢語音韻學史》, 北京: 商務印書館, 2011年。
  17. 李無未《臺灣漢語音韻學史》, 北京: 中華書局, 2017年。

18. 李無未《從德國甲柏連孜〈漢文經緯〉(1881)到清末中日〈漢文典〉----近代東西方漢語語法學史“映射”之鏡像》，北京：《中國語文》2017年第5期。
19. 豬狩幸之助《漢文典》，東京：金港堂，1898年。《漢文典》附錄〈韻鏡〉解釋“三十六字母條”，《漢文典》第102-104頁。
20. 佐藤仁之助《速成應用漢學捷徑》，東京：東亞堂，1910年。
21. 大島正健《韻鏡音韻考》，啟成社，1912年。
22. 張光宇《羅傑瑞教授與漢語史研究》，武漢：《語言研究》115-127頁，2014年第2期。
23. 羅傑瑞(Norman, Jerry)《漢語歷史語言學研究的新方法》(A new approach to Chinese historical linguistics)，朱慶之譯，收入四川大學漢語史研究所《漢語史研究集刊(第一輯)》，成都：巴蜀書社1998年。
24. 羅傑瑞《漢語概說》，張惠英譯，北京：語文出版社，1995年1月。
25. 羅傑瑞《漢語》(原版)，北京：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08年6月。
26. 丁邦新《臺灣語言源流》，臺北：學生書局，1979年。
27. 丁邦新《〈漢語方言區分的條件〉》，《慶祝李方桂先生八十歲論文集》，《清華學報》14.1.2：257-273，1982；《丁邦新語言學論文集》，北京商務印書館，1988年。
28. 東京外國語大學アジア・アフリカ言語文化研究所編《小川尚義、淺井惠倫臺灣資料研究》，2005.ISBN 4-87297-900-1. 東京。
29. 項夢冰等《漢語方言地理學——入門與實踐》，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05年。
30. 李方桂《中國境內的語言和方言》，英文《中國年報》，1937；1973年美國《中國語言學報》重印；北京：《民族譯叢》1980年第1期1-7頁，梁敏譯文，根據美國《中國語言學》創刊號。
31. 梅祖麟《康拉迪(1864—1925)與漢藏語系的建立》，《漢藏語學報》第4期，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年。
32. 林初梅《小川尚義論文集》，三元社，東京：2012年11月。
33. 鄭曉峰《評林初梅在〈小川尚義論文集(複刻版)日本統治時期における臺灣諸言語研究〉》，臺北：《臺灣語文研究》，2012年第7卷第2期，131—135頁。
34. 楊秀芳《閩南語文白系統的研究》，臺灣大學中文系博士論文，指導教授丁邦新，臺北：1982年5月。

35. パウル (paul)《言語史原理》，1880年出版，福本喜之助翻譯，東京：講談社，1965年。
36. 東條操《方言研究小史》(《方言學概論》)3-29頁，國語學會編，東京：武藏野書院，昭和三十七年(1962)十一月。
37. 石黑魯平《國語教育の基礎としての言語學》，東京：明知圖書株式會社，昭和四年(1929)三月。
38. 小林好日《東北方言の言語地理學的解釋》，《國語學諸問題》460-504頁，東京：岩波書店，昭和十六年(1941)八月。
39. 柴田武《方言論》，東京：平凡社，1988年7月。
40. 遊汝傑《西洋傳教士漢語方言學著作書目考述》，哈爾濱：黑龍江教育出版社，2002年。